

传统已秋，精神日新——关于话剧《立秋》的思考

王俊

作者赐稿

—

看完大型话剧《立秋》之后，使我感触至深的不在于这部话剧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反映了晋商——一个旧式中国传统商人集团，如何同现代中国的步伐不相一致，从辉煌走向没落。复制了类似于中国数个王朝衰败的历史悲剧。我更加关心的是在一个相对广阔的传统文化的和外来文化的交织碰撞的背景之下，在一个一贯固守传统的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那些人们对于“传统”的认识的偏差是什么？这种偏差在我们今天主流的话语大力提倡恢复传统的情况下，对我们是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然这种解读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所谓“戏剧研究”，但是仅仅作为一种尝试也未尝不可。

话剧《立秋》所设置的社会背景是清末民初——一个社会、历史与人的社会文化心理都激烈变动的时代：旧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而新的时代面容仍然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处于这样一种类似“真空”的社会形态之中的人们在心理上的彷徨与无可依托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剧中，虽然时令已经是立秋时节，但是，剧中的人物，无论是作为总经理的马洪翰，副总经理的许凌翔，以及马老太太，幽锁深闺的，马瑶琴都有一种与外界天气相对应的一种烦躁不安的情绪。在一种人无法预知未来的有些让人“痛苦的混乱”的环境之中。彷徨、无可依托并进而被一种烦躁的情绪所攫取，这点也并不难理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绪是否可以看作是在那一时期，我们的民族的精神状况的对个人精神状况的一定程度的映现呢？

《立秋》的地理环境的是当时还相对封闭的中国内陆的山西省的某个县（尽管马洪翰仍时时不忘向人们炫耀其祖上“光荣”的奋斗史，但其实他的足迹也很少步出山西的）而在这种相对闭塞的环境之下。他的不见容于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他因袭了传统的沉重的包袱，你很难让他去摆脱它们而向现代迈进。他身上的所谓“传统”既是他曾经赖以成功的秘诀，同时也是促使“马洪翰们”最终走向失败的主要因素。在这里，话剧所展示的并不是对这种所谓“传统”的批判，而是更多的迷恋于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对传统的迷信。无论是马瑶琴多年以来一直被其父禁止走下她的绣楼，还是马家少爷与马洪翰对唱

《清风亭》，亦或是马老太太在剧终之时开启她的秘密金库。所有的这些都不能摆脱传统的笼罩。这种传统有一种巨大的历史的惯性。《立秋》的时代是这样，这里不用提什么辛亥革命不彻底之类的“历史定论”。这种历史的惯性似乎是已经深深植根于民族与国人的血液之中了，以至于清除它们是不利影响是如此的艰难。《立秋》的宣传海报上不是说“《立秋》的民族精神的呼唤”吗？可能这也是导演和创作人员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他们又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完全全的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了呢？

在时间已经进入所谓新世纪的今天。传统又一次走红了起来，而且都呼唤“民族精神”之名。我们在谈论“民族精神”时更多的关心的是传统的东西。传统固然不是一无是处。但是百年来的经验已证明了传统的模式在禁锢了人们的手脚之后，也禁锢了人们的大脑，进而禁锢住整个民族向前的步伐。而长期以来在谈论“民族精神”之时，其实是将其与“民族传统”是划了一个等号了的。其实两者是完全不可以等量齐观的。传统永远有其保守与僵化的一面，而精神的魅力则在于自由、独立与创新。可是，剧中所传达出来的则更多的是对所谓“祖训”的恪守不移，以及更多的伦理与道德的教化。并且使人误以为这便是所谓的“民族精神”。这实在是一种概念上的偷换。它也并不能对民族精神的重建有什么大的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话剧所呼唤的并不是什么民族精神，更多的则是一种民族的传统，且更多的是伦理道德的传统。不管主流的话语对其贴上和种民族化的标签，如果与今天的民族精神的进步没有意义的话，它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的。

在上面所提到的社会文化的背景，其实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背景。这个背景如同“铁幕”一样将人们封闭在其中。这种闭塞时间之长，使马洪翰们一旦在遭到外界的压力之时，便会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面对。在剧中，这种传统所体现出来的“晋商文化”也曾经使他们的事业辉煌过，但是时过境迁，当一种文化的生命力眼睛被消耗殆尽的时候。长期被它浸润在其中的那些个体的生命的悲剧性便会很快的显现出来。马洪翰是这样，马瑶琴是这样，马老太太是这样。甚至连要求把票号改成银行的许凌翔也是这样——他最终还是与马洪翰和解，和他一起“共渡难关”。这表面上看起来好象解决了票号的难题。但是其实是他的那些新的理念被传统所俘虏，在传统面前遭到了失败。这是一种更为巨大的悲剧。在一种文化传统的巨大的惯性面前，个体的命运有着超出一般的

悲剧性。他们想要把握自己的命运，然而却总是被他们所无法认识到的巨大的力量所裹挟而身不由己时，他们所感觉到的大约就是一种莫可名状的焦虑吧。这种生存状态不知道是否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但是，至少我知道，这种情况被展示出来后，导演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厦门大学图书馆